

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视角下 中国与东盟、美国的贸易失衡*

王 勤, 黄光锋

(厦门大学,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 本文对中国、东盟以及美国在产品内分工的程度进行了探讨,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近年来中国与东盟, 美国的双边贸易和世界贸易结构, 表明中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处于加工装配和出口最终产品的地位, 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获取的价值有限。但随着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 出现沿着产业链向上移动的趋势。中国、东盟在不断融于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 与在研发、设计和营销等环节上处于价值链上游的美国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三方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决定的产品内国际分工是贸易失衡的根源。只要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未变, 贸易失衡的状况将会持续存在。

关键词: 产品内分工; 零部件; 价值链

一、引言

随着中美双边贸易的发展, 中美贸易失衡也日益加剧。2013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5624.5亿美元, 增长4.9%。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3184.2亿美元, 增长1.1%。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贸易摩擦从传统的家具玩具、皮革制品和机电产品升级到光伏产品等新领域。除了反补贴、反倾销调查外, 美国还对中国企业启动了知识产权“337条款”调查, 中美贸易失衡已成为不断困扰两国贸易发展的最大问题。与此同时, 2013年, 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达4436.1亿美元, 同比增长10.9%, 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也在持续扩大。目前, 中国与东盟基本实现了贸易的自由化, 中国对东盟10国进口的90%以上的产品实现了零关税, 东盟6个老成员国也对自华进口的90%以上的产品实现了零关税, 4个新成员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将在2015年实现这一目标。随着双方经贸往来的日益密切,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逆差也在持续发展。研究中国、美国与东盟三者之间不平衡的贸易结构有利于理解中国的贸易收支状况, 并为相关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国内外学者对中美贸易失衡的研究很多, 大多文献集中在中美贸易失衡原因方面的研究上, 这些研究

集中于: 中美统计标准的不同(Fung and Lau, 2003; 原玲玲 2005);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黄晓凤, 廖雄飞, 2011); 国际产业转移中的东亚因素(卢万青, 2009); 储蓄失衡(任若恩, 覃筱, 2006)。而对于中国与东盟贸易不平衡的原因的研究, 主要有: 中国与东盟资源禀赋不同(李健伟, 2007), 产业转移中美国进口商品的生产地点从东亚转移到中国(Feenstra R C, 海闻, 胡永泰, 1998), 东亚生产网络的运行对区域外的最终产品消费市场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以及外部市场的脆弱性(Athukorala P C, 2011)。而最新的研究趋势则是从产品内国际分工和全球生产网络的角度探讨我国商品贸易顺差的必然性问题(蒲华林, 2011)。

中国和东盟(除新加坡、文莱之外)都属于发展中国家, 这些国家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吸引了大批跨国公司的进入, 并逐渐融入到以垂直专业化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垂直体系中。考虑到中美贸易不断扩大的顺差, 中国与东盟的持续逆差, 我们应该看到, 经济全球化下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应该从产品内分工的背景下进行分析, 而不再局限于区域生产网络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与东盟、美国的国际贸易收支状况。基于此, 本文集中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与美国、东盟的贸易失衡的原因和影响进行分析, 并探寻减少

作者简介: 王勤(1958-), 男,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东南亚经济、亚太经济; 黄光锋(1981-), 男,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世界经济。

*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资助项目《东南亚地区发展报告》(11JBG029), 主持人: 王勤;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东盟国家产业结构研究》(11JJD810020), 主持人: 王勤。

中美贸易摩擦的有效途径。

二、中国、美国、东盟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根据卢锋（2004）的定义，产品内分工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国际化演进过程或展开结构，其核心是指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不同区段、不同零部件在空间上分布到不同国家，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产品生产价值链的特定环节进行生产。

随着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产品分工的细化，这使得欧美等发达国家将一些非核心的生产和服务等业务分离出去和全球采购更加有效益。国际分工迅速由“产业间”、“产业内”向“产品内”分工深化。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是产品内分工的基础和源泉。发达国家在研发、设计和营销上占据优势，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则表现在对零部件的初级加工、装配等劳动密集型环节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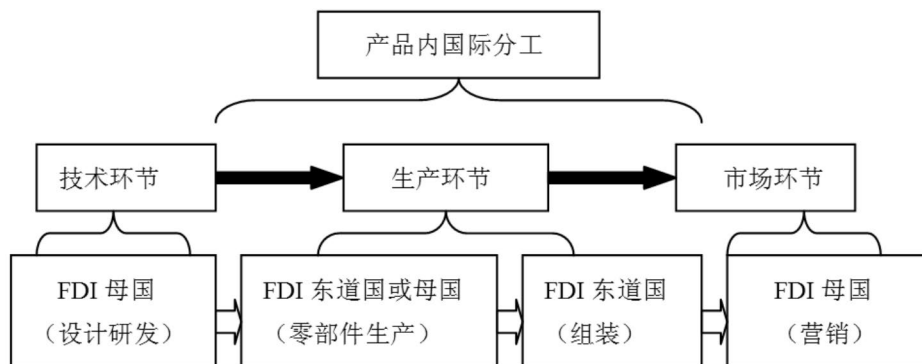


图1 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

产品内分工的发展使得某产品的生产不仅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区），而是由区域内的某些国家（或地区）分工协作共同完成。大型跨国公司将价值链上的每个环节进行拆分，然后从全球范围内寻求最适当的生产地，以此来创造其产品新的利润空间。以美国苹果公司生产的智能手机 iPhone 5S 为例，除了程序开发、外形设计和极少核心零部件是由美国本土苹果公司总部完成以外，整部手机包括零部件的制造及组装都是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完成的，涉及的国家有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和东盟等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CTAD）2013 年数据显示，东盟国家货物贸易出口占 GDP 的比重达到 57%。2013 年，东盟中间产品贸易占总贸易额的比重为 64.1%，占总贸易额的一半以上，超过了初级产品和最终产品的总和。这主要是由于在以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垂直分工体系生产工序分工催生了大量中间产品贸易造成的。当产品内分工成为当代主要的分工形式，原来以最终产品贸易为主的国际贸易形式变为越来越多的以中间产品贸易为主，传统上产品的“国家制造”也已经转变为“世界制造”，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跨越国界，形成跨境生产网络。中间产品和零部件贸易所占的比重可体现一个国家在产业链国际分工中的程度和层次。

目前经济学界关于产品内国际分工强度的衡量尚未形成一致的方法。文献中常见的测度方法主要有：垂直专业化比率 VS 指数（Hummels 等，2001）；进口中间产品占中间投入品总量的比重（Amiti and Wei，2004）；进口中间品占进口总量的比重（Yeats，

2001）。综合考虑以上几种方法之后，我们以中间品的进出口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作为衡量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指标。另外，中间品贸易衡量的确定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根据投入产出表进行测算，另一种是现在常用的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UN Comtrade）进行测算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对中间投入品的界定更为准确，但对数据要求较高，过于依赖难以反映现实贸易结构和贸易规模的投入产出表。第二种方法虽然在中间品划分的精确性上稍显不足，但能够得到可比、连续的时间序列数据。因此，我们采用后一种研究方法，根据联合国按产品的最终用途，将贸易数据划分为与国民核算体系（SNA）相对应的宽泛经济类别（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 简记 BEC）进行测算。参考 Lemoinefrancoise（2002）和林桂军（2012）分类标准对贸易数据进行划分：初级品（111，21，31）、中间品包括半成品（121，22，322）和零部件（42，53）、最终品包括资本品（41，521）和消费品（112，122，522，61，62，63，51）。这种商品分类方法能够分辨出各经济体的国际分工状况，从而揭示各经济体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我们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内容进行划分，考察不同层次的分工合作对于价值链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存在异质性的作用。根据中间产品组成的划分，半成品主要用于纺织服装、家具制作，食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的投入，属于相对低层次的分工领域。而零部件则主要用作精密仪器、机械制造、交通运输工具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附加值比较高，属于相对高等次的分工领域。由于老挝和缅甸数据的缺失，本文统计了

东盟八个国家的产品内分工程度数据。数据来源 UN Comtrade。

(一) 中国的产品内分工程度

2003 年至 2013 年，中国中间品的贸易占对外贸易额的比重都在 40% 以上，初级品在 13% 左右，最终品在 47% 左右。中国中间产品占总贸易额的比重从 2003 年的 47% 下降到 2013 年的 40.1%（如表 1），比重在逐年下降，说明产品内分工的强度有所下降，零部件占中间品的比重在十年的时间里都是低于 50%，即零部件贸易额低于半成品的贸易额，半成品依然是中国中间产品贸易中占据优势的产品。

在进出口方面，零部件出口比重从 2003 年的

8.0% 上升至 2013 年的 9.6%，而进口比重则从 13.2% 下降到 11%，中国的零部件进口一直大于出口，是零部件净进口国，但逆差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在未来几年，中国零部件出口有望超过进口，成为零部件出口国。零部件的生产，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参与产品内分工的精度，零部件出口的增加，说明中国虽然制造业整体上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分工体系的中后端进行生产合作，但随着参与生产网络过程中知识的传播和吸收、生产技术外溢、劳动生产率提升和规模经济效应，中国的制造业技术水平会得到不断提升，出现沿产业链向上移动的趋势。

表 1 2003 年 - 2013 年 中国、美国、东盟中间品贸易比重 (%)

国家	年份	中间品占总贸易比重	中间品组成中		零部件出口占总贸易比重	零部件进口占总贸易比重
			半成品占中间品比重	零部件占中间品比重		
中国	2003	47.0	56.2	43.8	8.0	13.2
	2008	45.9	51.6	48.4	9.1	12.8
	2013	40.1	51.5	48.5	9.6	11.0
美国	2003	42.1	48.5	51.5	11.3	10.1
	2008	38.0	55.3	44.7	8.6	8.7
	2013	36.9	58.1	41.9	6.7	8.6
东盟	2003	61.5	63.2	36.8	24.8	16.5
	2008	63.8	59.1	40.9	26.1	16.9
	2013	64.1	62.4	37.6	23.3	13.0

资料来源：根据 UN Comtrade Database 计算编制。

(二) 美国的产品内分工程度

2013 年，美国最终品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比重在 49.6% 左右，初级品比重在 13% 左右，中间品的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从 2003 年的 42.1% 下降到 2013 年的 36.9%。中间品占比处于下降趋势。中间产品中，美国零部件贸易占中间品贸易的比重在近十年间呈下降趋势，占比从 2003 年的 51.5% 下降到 2013 年的 41.9%，而半成品反之，比重从 48.5% 上升到 58.1%，这表明，中间品当中代表高层次分工的零部件占比低于半成品占比。结合零部件进口和出口在总贸易中的占比都呈下降趋势这一背景，可以清晰表明，美国虽然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设计研发的高端分工环节，但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差距有逐渐缩小的趋势。

(三) 东盟的产品内分工程度

东盟中间品贸易在 2003 - 2013 年的十年时间里，占总贸易的比重平均为 62%，初级产品和最终品的比重总和为 38%。中间产品贸易是东盟国家最主要的对外贸易产品。同时，东盟国家零部件出口占总贸易

的比重在 23% 以上，而零部件进口低于 20%。在 2013 年，零部件出口占比是 23%，进口占比是 13%，东盟国家零部件出口大于进口，是零部件净出口国。从中间品的组成来看，近十年来，半成品和零部件的比例基本保持在 6 比 4，即半成品贸易比重大于零部件贸易比重，这说明东盟中间产品贸易中，零部件贸易并不占优势，更多的是半成品贸易。东盟虽然是零部件顺差国，但从总体上看，东盟的出口仍主要集中在初级零部件和半成品，而半成品主要用于家具玩具、皮革制品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的投入，在分工体系中属于相对低层次的分工领域。

三、产品内国际分工视角下中国、美国、东盟的贸易格局

(一) 中国与东盟、美国的贸易失衡

一般而言，国际贸易是由国际分工决定的。产品内分工的出现，为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接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链条上的加工组装环节以及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中国和东盟发展中国家能以比较优势广泛参与国际分工。表 2 显示的是中国与美

国、东盟和世界的贸易差额。中美贸易方面，中美贸易顺差从2002年的427.2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2189亿美元，十年的时间里，中美贸易顺差上升了5倍。除了在2008年遭受经济危机，中美贸易差额有所下降之外，近十年来基本上处于上升阶段。中国与东盟贸易方面，中国自1998年以来一直是东盟的贸易逆差国，贸易逆差从1998年的15.7亿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193亿美元。期间，贸易逆差额在2004年

达到最大值的200亿美元左右，随后贸易逆差缓慢缩小，而贸易逆差额最小是在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为4.2亿美元，但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中国与东盟的贸易迅速回升，并逐年增加，在2012年，贸易逆差反弹至193亿美元。中国与东亚贸易逆差的情况与之类似，近三年，中国与东亚的逆差在2000亿美元以上，且逆差在不断扩大。

表2 2002-2012年中国与美国及东盟的贸易差额(亿美元)

年份	中国与美国	中国与东盟	中国与东亚	中国与世界
2002	427.2	-76.1	-571.7	304.3
2003	585.1	-164.0	-945.4	255.3
2004	802.8	-200.8	-1265.2	319.5
2005	1141.7	-196.3	-1359.1	1020
2006	1443.0	-182.1	-1539.0	1774
2007	1632.9	-142.2	-1713.0	2618
2008	1710.2	-28.3	-1529.7	2981
2009	1433.4	-4.2	-1475.7	1957
2010	1812.6	-164.0	-2276.5	1831
2011	2023.3	-182.3	-2636.5	1549
2012	2189.0	-193.2	-2836.2	230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计算编制。

表3 从产品分类看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差额(亿美元、%)

年份	初级品		中间品				最终品			
			半成品	零部件	半成品	零部件	半成品	零部件	半成品	零部件
差额	比重	差额	比重	差额	比重	差额	比重	差额	比重	
2002	-24	-5.6	22	5.2	25	5.8	75	17.6	329	77
2004	-86	-11	58	7.2	60	7.5	274	34.1	498	62
2006	-87	-6	167	11.5	128	8.8	478	33.1	759	53
2008	-161	-9.4	206	12	161	9.4	605	35.3	901	52.6
2010	-241	-13.3	109	6.0	189	10.4	725	40	1031	57
2012	-349	-16.0	205	9.4	287	13.1	940	43.0	1098	52.5

资料来源：根据 UN Comtrade 数据计算而得。表中比重指中美各类商品双边贸易差额占中美贸易差额的比重。负数表示中国对美国逆差。

从产品分类看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差额(如表3)，中美贸易方面，初级品是贸易逆差，中间品和最终品都是贸易顺差。初级品贸易逆差额和贸易比重呈波动中上升，比重从2002年的5.6%上升至2012年的16%。中间产品中的零部件顺差比重从2002年的5.8%逐年上升至2012年的13.1%，且在2010-2013年间零部件比重大于半成品所占比重。这说明中国出口至美国的中间产品中，代表高端技术水平的零部件比半成品占有一定的优势。最终品是中美贸易

顺差贡献最大的产品，在2012年，最终品贸易顺差为2038亿美元，占中美贸易顺差的比重为90%以上。其中，最终品组成中的消费品，是中美顺差最大的来源。

图2表示的是中美贸易差额比重变化趋势的情况。初级品逆差比重逐年增大，半成品比重趋于平稳态势，而零部件顺差比重从2002年的5.8%逐年上升至2012年的13.1%，有逐年增大的趋势。而零部件产品大部分是相对高层次技术水平的汽车机械、精

密仪器等产品生产。零部件顺差的增大,说明中国在不断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参与产品内分工的过程中,随着知识积累、技术外溢、劳动生产率提升和规模经济,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技术水平在不断缩小。中国并没有被锁定在低端的生产分工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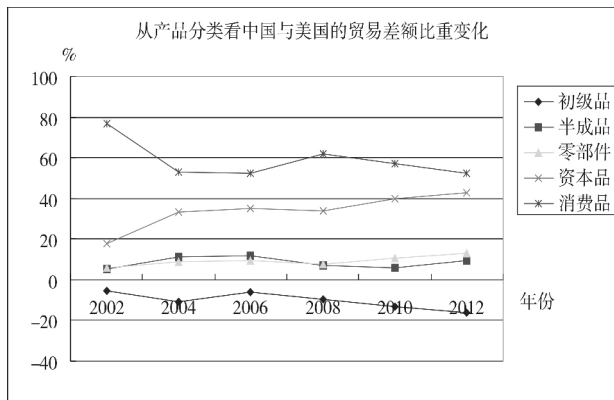


图2 从产品分类看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差额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 根据表3数据绘制。

最终品贸易顺差是中美贸易顺差最大的贡献来源。在2002年-2012年间,最终品顺差占贸易顺差的比重在80%以上。从最终品的组成来看,资本品和消费品比重在2012年分别为43%和52%。因此,在中美贸易顺差产品分类中,消费品贸易顺差占比是最大的产品,也是构成了中美贸易顺差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这说明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消费品出口国,美国消费了大量的在中国加工组装后再出口的最终品,中国的加工贸易特征明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跨国公司主导的

表4 美国与东盟、中国贸易差额(亿美元,%)

年份	美国与东盟的逆差		美国与中国的逆差		美国与世界的逆差
	差额	比重	差额	比重	
2002	-364.2	7.8	-1030.6	22	-4682.7
2003	-366.1	6.9	-1240.7	23.3	-5323.5
2004	-403.2	6.2	-1622.5	24.9	-6509.3
2005	-493.5	7.1	-2022.8	28.8	-6994
2006	-538.8	6.6	-2341.0	28.6	-8173
2007	-506.0	6.4	-2585.0	32.7	-7903
2008	-532.0	6.5	-2680.4	32.8	-8162
2009	-383.3	7.6	-2268.7	45.1	-5035.8
2010	-373.3	5.9	-2730.6	43	-6349
2011	-420.2	5.8	-2953.9	40.6	-7277.6
2012	-475.0	6.5	-3151.0	43.2	-7296.1

注: 美国与东盟的贸易差额是指美国与东盟10国贸易差额相加而成。

资料来源: 根据美国贸易统计数据库计算编制, <http://tse.export.gov/TSE/>。表中比重指各国与美国贸易逆差占美国总逆差的百分比。

全球生产网络分工体系中,中国基于比较优势原理处于国际分工布局的中后端进行生产合作。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充当了代表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贸易和组装的承接者,以及最终品供给者的角色。而欧美发达国家在产品的设计研发、营销和售后服务等环节上占据优势,处于生产分工的高端位置,是最终品的消费国。

(二) 美国与东盟、中国的贸易失衡

表4显示的是2002-2012年美国与东盟、中国以及世界的贸易逆差情况。一方面,美国与东盟贸易各年均均为贸易逆差。逆差呈波动上升,从2002年的364.2亿美元上升为2012年的475亿美元。虽然美国与东盟的逆差是上升的,但其逆差占美国与世界总逆差的比重是不断下降的。美国与东盟逆差比重从2002年的7.8%下降为2005年的7.1%,再下降为2012年的6.5%。另一方面,美国与中国的逆差比重,从2002年的22%逐年上升至2012年的43.2%,逆差比重在十年间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与东盟的逆差比重缓慢下降了,而中国与美国的逆差比重却大幅度上升。美国是世界贸易的逆差国,贸易逆差在2002-2006年间迅速扩大,在2008年达到峰值的8162亿美元,之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贸易逆差有所回落,在近两年以来一直保持在72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

从美国与东盟贸易产品组成来看,在2012年,美国与东盟初级产品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为11%,中间品贸易比重为29%,最终品贸易比重为60%。近年来,美国与东盟初级品贸易比重有上升的趋势。

(三) 三方贸易格局形成的原因

通过以上对中国与东盟地区贸易失衡和美国与东盟地区贸易失衡的研究发现,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逆差不断上升的同时,美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比重却相对下降了,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上升。到这里可以看出,东盟地区或国家把自己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给了中国,变成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随着跨国 FDI 在全球生产布局的不断调整,产品内分工成为当代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由于产品内分工使得国家之间的分工表现为产品生产链上不同环节的分工,而不是最终产品生产上的分工,因此国际产业转移的形式由整个产业的转移转变为产品生产环节的转移。进入中国的 FDI 尤其是制造业的 FDI 越多,中国的加工贸易越多,加工贸易在贸易差额中的比重也越大,向中国转移的原东盟国家对欧美的贸易顺差为中国自身对欧美的贸易顺差也就越多。

在 2002 - 2012 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 9% 以上,而同期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年均增长为 4.8%,只相当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一半左右。根据世界银行 2011 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对全球国家和地区国民收入水平进行分类,东盟国家中,除了新加坡和文莱属于高收入国家之外,大部分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缅甸、柬埔寨等甚至属于低收入国家。东盟国家收入水平低,储蓄率高,缺乏最终消费市场,从而对来自中国的最终产品的有效需求不足,是造成中国与东盟贸易逆差最直接的原因。同时,美国占据着产品内分工的高附加值的环节,获取了分工网络中的大部分利润。因此,向高收入、低储蓄、过度消费的美国输出大量最终品也加剧了中美的贸易顺差。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充当了加工贸易和组装的承接者以及最终品供给者的角色。以此,我国与东盟的贸易逆差,与美国的贸易顺差,是产品内国际分工与贸易的自然结果。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中国的贸易失衡,就需要改变国际分工体系,而这有赖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新技术的诞生以及贸易规则的改善。在这过程中,贸易保护并不能改变三方的贸易失衡格局。

四、产品内国际分工下中国、东盟的价值链提升

表 5 2012 年中国、东盟、美国 SITC75 类产品出口的技术复杂度 (PRODY)

	中国	中国台湾	日本	韩国	东盟	美国
RAC	1.72	3.10	1.81	1.93	2.14	0.85
PRODY	5003.20	62532.32	52739.56	43573.23	17651.36	36326.87

资料来源:根据 UN Comtrade 数据、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计算而得。

如表 5 所示,中国在 SITC75 类产品的显示性比较竞争优势 (RAC) 虽然达到 1.72,高于美国的 0.85,在这一类产品上的国际竞争中具有比较竞争优势,但比东亚 (包括中国台湾、日本、韩国、东盟)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背景下,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会反映在其生产和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水平上。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处于生产价值链中的研发设计和关键零部件生产等技术复杂度较高的环节,而发展中国家则集中于原材料供应、简单零部件生产和加工组装等技术复杂度较低的工序。依照贸易结构反映生产结构的逻辑,一国或地区的出口复杂度可反映出该国和地区在全球价值链所处的地位。出口复杂度最早由 Hausmann 等 (2007) 提出,计算了某一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 (PRODY):

$$PRODY_k = \sum_j \frac{X_{jk}/X_j}{\sum_j (X_{jk}/X_j)}, k \text{ 代表某一产品,}$$

j 代表某一出口国家或地区。 X_{jk} 表示 j 国家 k 产品的出口额, X_j 为 j 国家所有产品的总出口, X_{jk}/X_j 表示 j 国家 k 产品的出口份额, Y_j 为 j 国家的人均 GDP。因此,该公式表明某一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为该产品各出口国的人均 GDP 的加权平均,权重为各国在该产品出口方面的显示性比较优势。

在 2002 年 - 2012 年间,中国对外贸易活动中,中间品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在 40% 以上,而零部件贸易占中间品贸易的比重则在 44% 以上,且零部件占比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中国正以零部件出口制成品的形式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SITC) 各部门中,中国出口份额减少幅度最大的为 SITC1 - 4 (农业和服饰部门); 而出口份额增长最大的为 SITC7 (机械及运输设备部门)。在增幅最大的制造业部门各类中,呈现出出口份额由 SITC 84 (服饰类)、SITC65 (纺织品类) 和 SITC 85 (鞋类) 向 SITC76 (电讯类)、SITC 77 (电动机械、电器和零部件) 和 SITC 75 (办公机械和自动数据处理机器) 转移的趋势。其中, SITC1 - 4 类大多为初级产品, SITC7 类大多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成品, SITC8 大多为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经过比较,与欧美市场贸易活动中,进出口增长幅度最快的是 SITC 75 (办公机械和自动数据处理机器) 产品。本文以 SITC 75 为例考察我国和部分国家在全球生产链中的地位。

都低,在与东亚主要经济体的比较中属于比较后的排名。在出口复杂度方面,中国台湾最高,这说明中国台湾在办公机械和自动数据处理机器等产品的生产上具有较强的优势,在这一类产品全球价值链中处于

生产的核心地位。其次是日本、韩国和东盟。中国和东盟的出口技术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十分低，这也说明中国在 SITC75 类产品的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加工组装阶段。

总的来说，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价值链环节中，主要负责加工组装出口制成品，东盟则从事简单的初级零部件加工工作，中国台湾和日本专注于高等技能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活动。中国仍位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端，如果要实现国际分工尤其是制造业产业链分工中的升级，从制造业大国变为制造业强国，中国企业必须从零部件的升级做起。

五、结论与启示

产品内分工为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此背景下，从广义商品贸易组成数据论证了中国、东盟、美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参与国际分工的具体位置，解释了贸易不平衡的根源在于各自在全球生产网络分工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过对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几点结论：

1. 中国、东盟和美国在产品内分工的位置决定了三方贸易格局。在这个产品内分工体系中，美国、日本等从事高附加值的上游部分（研发设计和核心零部件生产）和下游部分（营销和售后服务），我国从事低附加值的中游部分（加工装配）和部分上游部分（零部件生产），东盟则主要从事简单零部件生产以及出口至中国进行加工组装。由于我国从事贸易品最后的生产环节（即加工装配），东亚产品内分工网络对欧美国家的出口便成了我国的出口。因此，我国贸易顺差是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结果。产品内分工格局体现了我国外贸两头在外、高顺差、低附加值的特征，更揭示了处于全球生产网络高端位置的欧美把贸易失衡的根源归结为中国事实。只要三方在全球生产网络产品内分工中的相对位置不变，贸易不平衡的格局将会持续发展，

2. 深化区域合作机制，开拓多元新兴市场。高度依赖欧美等市场的消费需求已被证实对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较高风险且不可持续。在东亚地区，尽管区域内已有了各种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10+1”、“10+3”等合作机制，但是，各种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仍然阻挠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些经济活动，日本、东盟均对中国可能主导区域经济一体化抱有强烈戒心。同时，美国为了其在东亚的利益不受损害，不断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加以干涉，TPP 的发起

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中国应当突破现有贸易对象和流向，积极开拓南美、中东、东欧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市场，以减少欧美贸易制裁。

3. 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于价值链提升的积极作用主要来源于高层次的分工合作，即以零部件贸易所反映的资本密集型生产阶段的专业化分工，而以半成品贸易所反映的低层次分工的贡献并不是很大。发展中国家想要尽快改变价值链中的不利位置，关键在于创造条件引导分工合作的层次提升，在追求动态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增强本土企业在高技术含量的零部件方面的生产和供给能力，主动切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参考文献：

- [1] Athukorala P C,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rade Patterns in East Asia: Regionalization or Globalization [J]. Asian Economic Papers 2011. (1): 65 - 95.
- [2] Fung, K. C., Lau, L. J., Adjusted Estimates of United States - China Bilateral Trade Balances: 1995 - 2002 [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3. (14): 489 - 496.
- [3] 黄晓凤, 廖雄飞. 中美贸易失衡主因分析 [J]. 财贸经济 2011. (4): 85 - 90.
- [4] 卢万青. 我国贸易顺差的成因及变动趋势 [J]. 国际贸易问题 2009. (7): 61 - 69.
- [5] 原玲玲. 应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政策选择 [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5. (3): 70 - 73.
- [6] 李健伟. 中国对东盟贸易逆差问题探析 [J]. 国际贸易 2007. (8): 8 - 12.
- [7] 赵立斌. 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看中国与东盟、美国的不平衡贸易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13. (12): 67 - 72.
- [8] 蒲华林. 产品内国际分工与贸易对我国贸易平衡的影响分析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1. (5): 15 - 22.
- [9] 华晓红, 周晋竹, 宫毓雯. 全球价值链与东亚生产网络 [J]. 国际贸易 2013. (7): 12 - 17.
- [10] 唐海燕, 张会清. 产品内国际分工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提升 [J]. 经济研究 2009. (9): 81 - 87.

(编辑校对: 崔文林)